

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全球发展倡议

高大伟

“人类应该为减轻世间所有苦难和残忍的总和而不懈努力：这是首要职责。”

——罗曼·罗兰（1866-1944）《约翰·克里斯朵夫》

研究摘要

中国为丰富全球治理而提出的倡议，包括“全球发展倡议”，在中华文明复兴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化同时因“失败的国家”和“失败的世界”而倒退，因为世界无法找到人类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和环境危机的解决方法，因此这些倡议对于应对复杂的全球化进程而言也是必要的。

复杂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概念如今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它不仅与全球化的历史有关，也与伴随全球化出现的地缘政治转型有关。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全球化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全球治理的问题。政治学将继续对权力的机制、政治体制的性质以及国家间的关

系提出问题，但不必再对已经存在的正确定义加以剖析，即“一套用以阐述、决定、合法化、执行和控制集体规则的交易”¹。

有分析人士认为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倒退。随着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去全球化”一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大企业的董事会以及思想辩论中。

确实有一些迹象表明全球化正在倒退。自 2020 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无疑对各国对待其国家主权的方式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

他们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在公共卫生危机来临时能够独立应对，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危机势必会再次出现²。

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前，2016 年英国脱欧证实了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的支持者将其作为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认为全球化造成了疏离，加剧了不平等问题。

再者，2021 年 1 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的任期结束，其本人就代表着某一种形式的民粹主义，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中美两国“脱钩”的紧张局势。

最后，爆发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的俄乌冲突使因疫情而经济衰退的国际社会遭到进一步分裂³。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之一是通货膨胀⁴，在这种情况下，穷国首当其冲，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动荡，就像 2022 年 5 月的斯里兰卡那样。

¹ “治理”的这一定义由帕斯卡尔·拉米提出。此处引用出自经济分析委员会的《全球治理》报告，作者皮埃尔·雅克、让·皮萨尼-费里、劳伦斯·图比娅娜，2001 年，第 13 页。

² 2022 年 5 月 20 日，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法国宣布其第二任期的第一届政府，其中经济部的名称里就包含了“主权”的概念，其全称为“经济、金融、工业和数字主权部”。

³ 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在 2022 年 3 月 24 日致股东信中写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结束了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经历的全球化。”

⁴ 皮埃尔-奥利维尔·古韩洽斯，《地缘政治构造板块的迁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物，2022 年 6 月：“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石油、天然气、金属和谷物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这些商品的价格飙升，在世界各地造成困难，导致通货膨胀大幅增加。”

显然，这些新的现实和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2005 年描绘的世界相去甚远⁵。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事件而选择采用一个单一、片面的去全球化理论，否则我们为完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而做出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全球化的确是复杂的，它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单维度的。它的进与退取决于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取决于民族国家选择服从的准则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此外，西方世界与其他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复兴之间必须找到新的平衡。

科技发展形成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⁶，是构成复杂全球化进程的客观要素，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尽管网络空间存在阻隔，但它还是产生了一些共通的参考、表征和行为，为全球各地的网民所共享。

同时，各国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不仅限于某个国家。他们需要应对的问题是跨国界的，也就是全球化的，需要通过有效的集体协作加以解决。威胁着全人类的气候挑战、生物多样性的保护⁷关乎到我们所有人，只有通过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才能解决。

此外，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世界各地的人民对归属于同一个人类文明的共识从未如此强烈。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共识会历久弥坚。有两项发展很可能成为这一现象的根源。其一是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史诗般的太空探索事业。我们不应低估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的“总观效应”，而且数十亿人都能够通过影像去感知这种效应⁸。

⁵ 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出版社，2005 年。

⁶ “掌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论坛 2016 年年会的主题。

⁷ 气候与第六次物种大规模灭绝之间也存在关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各委员会联合声明，2022 年 3 月 23 日：“气候变化和人类诱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系统，导致 1 万多个物种灭绝的风险增加。”

⁸ 1972 年 12 月 7 日从阿波罗 17 号上拍摄的名为“蓝色弹珠”的照片，现在已成为人们共同的难忘记忆。

另一项发展与能够加强人类共同归属感的新问题有关。例如在神经技术领域，技术的发展引发了一场超人类主义运动，虽然仍处于萌芽期，但它会帮助我们回归共通的人性，捍卫人类永恒的尊严。

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中，身份仅仅是各种相互交织的从属关系的集合。因此，一个人可以是中国人、法国人或加拿大人，拥有合情合理的爱国主义情感，同时也可以是亚洲人、欧洲人或北美人，甚至可以将自己视为一个“世界公民”。让·饶勒斯（1859-1914）早已对此做出过清晰的解读：“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只是同一种人类之爱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形式。”⁹

地缘政治是全球治理的决定因素之一

权力关系是全球治理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一直到 20 世纪末，权力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都是由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推动。美国从 1885 年起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¹⁰。

1978 年邓小平（1904-1997）宣布推行改革开放，中华复兴的进程开始加速，这深刻地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因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与全球治理工具之间关系的发展史，并分析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后者产生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本次研究的目的。

早在全球化出现前，中国哲学家就对“普遍性”进行了思考。人们经常论述“天下”的概念¹¹。古希腊的思想家们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几百年来，中国人或欧洲人已知的世界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换句话说，当时的制图师无法对地球做出准确、完整的描绘。

⁹ 让·饶勒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巴黎，1895 年，第 7 页。原文为法文。

¹⁰ 法里德·扎卡里亚，《从财富到权力：美国世界角色的不寻常起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6 页。

¹¹ 哲学家赵汀阳关于“天下”这一概念的研究促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之间成果颇丰的对话。

当然，也有一些强盛的伟大帝国创造了丰富的艺术财富。然而，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仍然是零碎的，即使他们通过贸易路线相互联络，但交流仍十分有限。

《坤舆万国全图》版世界地图可以说在规模和视角上都实现了改变。该地图印制于明朝 1602 年，由利玛窦（1552-1610）设计，是中欧交流的产物，地图上出现的美洲也扩大了官吏的研究空间。有了这张更接近世界真实地理状况的地图，欧亚大陆两端的人们都对普遍性有了更为具象的认识。

到了 18 世纪，奠定现代世界格局的趋势开始更精准地形成。工业革命缩短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人们开始相信进步，并逐渐摆脱了时间的周期性概念。人们开始讨论经济增长，世界人口也不断增加。

这个与启蒙运动密不可分的世纪引发了人们对普遍性的深入思考¹²。国际社会各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最初因殖民现象而被迫建立，而从那个承载着现代性的时刻开始，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被进一步强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治理体系在 19 世纪下半叶初具雏形。1874 年，《伯尔尼公约》签署，邮政总联盟成立，后更名为万国邮政联盟¹³。制定于 1886 年的《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也可以被看作是国际合作领域向前迈出的一步。此前，成立于 1863 年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为建立一个连通各国的更完善的体系指明了方向。

不幸的是，这些建设并没有带来普遍和平，结果却恰恰相反。1914 年，欧洲民族主义的碰撞引发了一场冲突（当时人们认为那会

¹²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基础性文件《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与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在巴黎夏洛宫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前者预示了后者的到来。

¹³ 万国邮政联盟已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其的官方语言为法语。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美国——特别是蒙哥马利·布莱尔（1813-1883）的推动下，人们才在 19 世纪末签署这一公约并创建了第一个国际组织。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特朗普政府威胁要退出万国邮政联盟。所幸，人们在 2019 年找到了折中的解决方案。

是最后一场冲突），导致 1500 万人死亡。美国直到 1917 年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是各国为结束战争在全球治理领域做出的第一次尝试，它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而他的国家却拒绝加入国联，这也注定了它的失败。

然后，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屠杀甚至更为惨烈，共有七千万人死于战火之下。除了惨绝人寰的集中营外，二战的另一个特征是核弹的使用，这也意味着随着二战的结束，原子时代开始了。

为防止世界重蹈覆辙，人们在 1945 年创立了联合国。军力耗尽的欧洲大陆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在 1993 年成立了欧洲联盟。

在孙中山（1866-1925）的领导下，年轻的中华民国于 1912 年诞生，它结束了清朝（1644-1912）对世界五分之一人口长达 268 年的统治。中华民国在 1914 年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后加入国联。二战结束后的第四年，毛泽东（1893-1976）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随后收回了因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¹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而失去的主权。要正确评价中国加入一个政府间组织意味着什么，还需要记住这个国家曾被剥夺了一个世纪的主权——从 1842 年《南京条约》开始，到 1949 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结束。

然而，早在 1953 年，周恩来（1898-1976）就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些原则蕴含着对和平的渴望，也预示着一种反映文化、历史和普遍性意识的世界观。

¹⁴ 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南京条约》（1842）和《马关条约》（1895）。《南京条约》使欧洲人进入上海，并宣布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马关条约》则将台湾交给了日本治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领导下的印度在 1947 年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他们同样认可这些原则¹⁵。

分析人士必须牢记，中国是一个体量庞大的人口大国¹⁶和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但更重要的是中国也是一个传承至今的文明古国，深知如何在四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

有迹象表明，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的中心，一个世界社会正在缓慢形成。这个过程不仅由西方文明所驱动，其源头是与之平行发展了数千年的其他文明。它们之间的和谐不易建立。这种现象更为复杂，因为必须将人口因素纳入考量。20 世纪初，世界仅有 15 亿人，而今年世界人口将达到 80 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融入现有体系的三十年（1971-2001）

1971 年 10 月 25 日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2758 号决议，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¹⁷的决议，中国重返联合国（前身为国际联盟）。

这一事件所属的这段外交史充斥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从更深的层面看，这也是一段布满殖民主义创伤和文化差异的外交史。当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冷战将世界分割成了两个对立阵营。新中国在北京成立几个月后就卷入了朝鲜战争，在 1950 至 1953 年间与美国展开军事对抗，两个对立阵营间兵戎相见。

¹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重申了这五项原则，并指出：“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¹⁶ 事实上，中国的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¹⁷ 该决议的结尾是：“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然而，在 1964 年，法兰西共和国的戴高乐（1890-1970）将军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尽管美国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政府试图孤立北京当局并对法方施压。这是冷战背景下的一个重大决定，它使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个国家之间建立起特定的关系¹⁸。

戴高乐这位兼具学识与远见的领导者所做的，只不过是为用户指明了历史的方向。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后的一年里，理查德·尼克松（1913-1994）总统在 1972 年 2 月访华，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会面。美国需要中国的支持以走出越南战争的陷阱，而中国则通过与美国修好，共同平衡国际安全局势。

美国和中国最终在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关系。同年 1 月 29 日吉米·卡特在白宫欢迎了来访的邓小平。

美国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同时，中国也进入了原子时代。随着 596 工程（又名邱小姐）的成功，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92 年，中国正式加入 1968 年制定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印度¹⁹至今未加入这个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的条约，而中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在核领域占据了核心地位²⁰。

随着联合国大会第 2758 号决议的通过，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联合国宪章》将世界团结起来，形成更强的政治凝聚力。但世界经济和货币系统的基础仍有待巩固。人们必须避免重蹈 1929 年的覆辙，这场危机引发了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当选时的德国社会正是因为 1929 年的危机而深陷贫困，失业率高达 30%。

¹⁸ 这些关系是特定的，仍然有拓展的空间。高大伟，《中华复兴管窥》，重要性与中心性，第 86 页。

¹⁹ 迄今为止，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都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²⁰ 《中国核电的未来》，马可·希布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 年 5 月 14 日。“中国正处于到 2030 年引领世界部署核电技术的进程中。如果成功，中国将在核技术发展、工业能力和核能治理方面占据全球领导地位。”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1919年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引起巨大反响。他在书中强调了经济重建的重要性，并提醒世人切忌让战败者蒙羞。

马歇尔计划（1948）和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的诞生都得益于凯恩斯的思想。从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中产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很大程度上是英国财政部顾问凯恩斯本人与美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哈利·德克斯特·怀特（1892-1948）达成妥协后的产物。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建立合作关系，当时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轨道，为市场发挥更大的力量提供了空间。

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国际贸易问题。继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之后，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了全球贸易的监管框架。

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观察员，中国自1986年以来一直在寻求加入这一协定。谈判的过程漫长而艰苦，但最终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

苏联解体十年后，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标志着全球治理体系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且以此为基础的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尽管一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2021年8月30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但这一全球化进程仍在江泽民（1989-200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时期不断向前推进。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全球治理支柱的十三年（2001-2013）

自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一直在稳步提升。

尽管存在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阻力，中国仍决心加入全球治理体系，而事实证明这确实对其有利。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其对和平的追求，符合其思考普遍性的能力，同时中国也在构成权力的所有层面不断为自身利益而努力。

在这个新阶段中，2008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年。中国举办了一场历史性的奥运会²¹，从此中国不仅成为了各大洲决策者不可避免的现实，也开始对世界舆论产生深刻影响。胡锦涛（2002-201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通过这场奥运会稳固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彰显了它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取胜能力——中国共获得48枚金牌，美国36枚。然而同年，中国还发生了一起超过10万人伤亡的大地震，从中可见一个古老文明在面对最具破坏性的冲击时的强大韧性。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1894年发起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关键角色。于再清也成为继何振梁之后第二位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中国人。

北京奥运会两年后，上海世博会成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另一件大事。2002年，经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八年间，中国的经济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截至2010年4月30日，已有200个国家和45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上海世博会。”，参观人次达到7300万，其中包括400万外国观众。

2010年，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²²，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²³。

²¹ 《回声报》，2008年8月24日，罗格主席为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闭幕。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席雅克·罗格（1942-2021）说：“通过这一届奥运，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了解，中国对世界也有了更多了解。”

²² 《中国：一个贸易巨人的崛起》，亚历山德罗·尼西塔，卡洛斯·拉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1年4月27日。

²³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贾斯汀·麦科里，茱莉亚·科尔维，《卫报》，2011年2月14日。

通过这些事件，中国重新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²⁴，这也意味着价值链开始重组，国家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使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从中受益。

凭借其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中国也在客观上成为了国际社会及其治理体系的支柱之一。这一点首先体现在政治和全球安全领域。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维和事业做贡献。2007年9月，赵京民出任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部队指挥官，成为首位担任联合国维和部队高级指挥官的中国军人²⁵。

中国的稳定作用也体现在经济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并没有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速——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9.4%。这一成绩当然与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有关，其优势之一就是能够与世界各大经济区域进行协调。事实证明，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提升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别的二十国集团成为能够应对最严重危机的新多边主义的象征。

中国也是这场多边主义转型的参与者。2016年发布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肯定了金融危机以来取得的进步，并呼吁加强合作，促进包容性增长。“杭州共识”的核心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然而此时，我们已步入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不再只是全球治理的支柱，它也成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倡议发起者。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全球治理倡议发起者的十年（2013-2022）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早在这一时刻之前，人们就时常强调全球治理体

²⁴ 中心性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自己的表述似乎很重要。此处可参考《中华复兴管窥》中《中国的中心地位》一文，第157页（见参考书目）。

²⁵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2020年。

系的不完善之处²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从华尔街爆发后，其波及范围之广使人们对这个严重失衡的体系是否可持续提出质疑。用托尼·朱特（1948-2010）简单而精准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²⁷。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强大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成为了发起倡议和行动的重要力量。

首先是“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这个具有全球雄心的战略为欧亚大陆、非洲以及南美洲的经济发展描绘了新的愿景。这个倡议至关重要，因为它的设计者既不是欧洲也不是美洲，而是一个不属于西方世界的大国。迄今为止，已有 146 个国家（联合国有 193 个成员国）加入了这个从最初就依托金融机构（包括丝路基金）务实构建起来的倡议。

第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²⁸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成立，旨在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背后新丝绸之路的愿景。作为一个注册资本为 1000 亿美元的新机构，亚投行的成立进一步完善了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组成的开发银行系统。

一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这些倡议旨在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中国只是在对客观需求做出回应，而中国也仍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柱之一²⁹。除亚投行外，新开发银行在上海成立。新开发银行最初又名金砖银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2021 年首次扩员，迎来新成员阿联酋、乌拉圭和孟加拉国。在成立后的六年中，新开发银行不仅为持续扩员奠定了基础，也将自身定

²⁶ 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诺顿出版社，2002 年。

²⁷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 年的小规模崩溃提醒我们，不受监管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大的敌人：它迟早会被自己的过度行为所害，并再次向国家求救。”托尼·朱特，《乡土式微》，企鹅出版社，2010 年。

²⁸ 《亚洲与世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洲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载于《中国与世界》第一卷，第 117 页（见参考书目）。

²⁹ 《中国与世界：全球金融结构演变中的中国角色》，马磊立，载于《中国与世界》第一卷，第 127 页（见参考书目）。

位为绿色金融领域的模范机构，这个领域对于应对环境挑战具有关键意义。

建设“生态文明”是 2012 年起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原则之一，在中共十八大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诚然，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是由法国外交部门在洛朗·法比尤斯的卓越领导下举办的，但如果没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大会就不会取得成功。《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达成也是如此，该计划使解决伊朗核问题成为可能。

2017 年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带来了重大变化，他使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国际社会不再试图完善多边主义，而只是努力避免其崩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法国和德国在 2018 年和 2019 年是如何共同应对美国所引发的重大动荡的，而后者不仅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是 20 世纪多边主义的提出者。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极力与多边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这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的内视心理。

继奥巴马和特朗普之后，与习近平对话的第三任美国总统是 2021 年 1 月上任的乔·拜登。他的当选预示着美国将重新为多边主义贡献力量，这自然是一件好事，但他需要首先修复前任所造成的破坏。

一方面是矛盾的政策，另一方面是连贯的战略，两者形成的鲜明对比很难不让分析人士感到惊讶。当美国在对未来世界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改变方针时，中国却始终坚守着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可预测的大国的立场。

首先是 2020 年底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协定签署的背景是美国再次向外界施压，企图孤立

中国。然而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已开始运行，共有 15 个成员国，分别占世界人口和世界经济的 30%。

此外，全球发展倡议将是另一个值得强调的倡议。

2.1 全球发展倡议：背景和内涵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1 年 9 月 21 日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

早在 2015 年，习近平就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这一机制已延期至 2030 年，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一致³⁰。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这次讲话围绕四个重点展开：战胜新冠肺炎疫情、重振经济和促进全球发展、实践以互相尊重为标志的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³¹。

从整体上看，这次在联合国框架内的演讲，首先是对反对单边主义的呼吁，也是对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的重申。四年间，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削弱了国家间的合作精神，低估其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是错误的。然而，中国国家主席明确表示：“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³²

当习近平提到第二点，也就是发展的要求时，他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这一倡议坚持发展优先，旨在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³⁰ 关于联合国活动的资金问题，有人注意到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捐助国之间的做法不同。“中国对联合国的及时和全额支付，与美国不断增长而不是缩减的债务和不良的支付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德鲁·海德如是介绍现状。《中国在联合国的新兴金融影响力对美国构成挑战》，史汀生中心，2022 年 4 月 4 日。

³¹ 习近平 2021 年 9 月 21 日讲话，见下文附录。

³² 习近平 2021 年 9 月 21 日讲话节选，见下文附录。

议程；坚持把人民的福祉放在核心位置；坚持关注最贫穷国家的需求；坚持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坚持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而服务；坚持行动导向³³。

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消除了其境内的极端贫困。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和近期历史，这可以说是一项鼓舞人心的独特成就³⁴。

中国之所以能够制定出服务于其他国家的战略，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发展领域的一个参照。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的影响力将与它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的能力成正比。换句话说，成功具有吸引力。同样的，失败也具有排斥力。

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自主意志和希望的体现。这种自主意志是解放和现代化运动的根源，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引领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2020 年，在世界庆祝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之际，习近平于 2020 年 9 月 21 日发表讲话。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信念：“人类战胜困难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

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资源，人类仍遭受苦难。在《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³⁵中，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有 1 亿多人重新陷入极端贫困。这份报告还提到，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 2030 年消除贫困的目标将无法实现，8 年后世界上的贫困人口将达到 7%。报告还指出，全球有 23.7 亿人“没有食物，或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均衡饮食”。

我们可以忽略它，甚至假装无视它，但问题的紧迫性已成事实。全球发展倡议旨在以负责任的方式对此做出应对。这一倡议也呼应了成立宣言中明确阐述的原则，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些原则。

³³ 习近平 2021 年 9 月 21 日讲话，见下文附录。

³⁴ 《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世界银行集团，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2 年。

³⁵ 《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联合国，2021 年。

《联合国宪章》第九章第五十五条提醒我们，各成员国应促进“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

2.2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反响

中国国家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一个月后，也就是在 2021 年 10 月 25 日第 2758 号决议通过 50 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此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几份官方文件都提到了这一倡议。

2022 年 1 月，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立。启动会议汇集了 100 个国家和 20 个国际组织。在撰写本报告时，已有 53 个国家加入了中国发起的这项倡议。

2022 年 5 月 9 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举行高级别视频会议，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主持³⁶。会议由国务王毅委员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首先致辞，各界人士借此机会讨论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意义以及与现有项目的协同效应。泰国副总理敦·帕马威奈、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比拉瓦尔·布托·扎尔达里、新加坡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柏罕加福、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图·乔伊尼、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凯里、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等人士在会上发言。

³⁶ 发展倡议在联合国广受赞誉，《中国日报》，2022 年 5 月 10 日。

非洲联盟委员会前副主席伊拉斯塔斯·姆文查也曾对全球发展倡议明确表态。他说，全球发展倡议对非洲至关重要。

2022年4月25日，当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受到国务委员王毅的接见时，他宣布将尽一切努力确保中国的努力与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协同并进。

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也通过论坛在中国的代表艾瑞碧表达了对这一倡议的支持³⁷。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总干事桑达·奥佳博在2022年6月1日发布《中国战略》，加大力度支持全球发展倡议³⁸。该组织致力于动员私营部门超越对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

尽管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战争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分裂，并占据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力，但全球发展倡议仍在提出后的短短数月中建立了良好势头。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巩固并强化这一势头。

2.3 全球发展倡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2021年10月25日第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之际，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谈到了全球发展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2000年，随着千年发展目标的提出，国际社会明确了2015年前需要实现的发展目标。2015年，联合国制定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对2030年提出了新的要求。尽管中国取得了成果，但如果一切照此发展下去，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无法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在2022年5月举行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示：“进展面临风险。”³⁹

³⁷ 《中国的努力如何推动全球发展》，艾瑞碧，2022年5月25日。

³⁸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中国战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2022年6月1日。

³⁹ 发展倡议在联合国广受赞誉，《中国日报》，2022年5月10日。

我们决不能忽视可持续发展目标。然而，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阻碍进展的巨大障碍。上文提到的《2021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疫情中止或逆转了健康方面的进展，并缩短了预期寿命。”这场疫情还抹杀了 20 年来教育方面取得的进展，还导致了相当于 2.55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的损失，是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四倍。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也在其 2022 年的报告中对亚太地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提出了警示⁴⁰。该报告明确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将无法实现这 17 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

无论是对亚太地区还是对整个世界而言，与和平相关的第 16 个目标显然具有根本性意义。2022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不仅重申了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在一定意义上对全球发展倡议进行了补充。这与前文提及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是一致的，其名称不言自明。

2022 年 6 月 1 日，国务委员王毅在向中俄智库高端论坛的致辞中将这两项倡议联系起来，他表示两者旨在消弭和平、安全、信任和治理方面存在的赤字⁴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石之一。这一进程既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也体现着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投射。邓小平设计的开放道路不仅需要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接收能力，同时也需要一种对外部世界的释放能力。

⁴⁰ 《2022 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报告》，亚太经社会。

⁴¹ 中俄智库高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共同举办，自 2018 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此处出自王毅在论坛上的讲话，全文见：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202206/t20220601_10697595.html

这种影响力在物质层面的投射是显而易见的，形式包括出口、投资以及企业国际化等等。虽然从“质”的角度看并不明显，但这种影响力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个文明的复兴不仅包含一系列“量”的因素，同时也是对古老思想和价值观的重新激活。

这场文明复兴的核心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⁴²这一理念。2018年3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在客观上融入世界的一个原则，它也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战略的建立和论证提供了依据。如果各国的未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如果各国的未来是相互依存的，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懈地努力，把那些仍处于现代化边缘的国家纳入其中。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是近些年才提出的，但激活这一理念的精神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特征之一。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儒家“大同”概念的一种演变。到了近代，康有为（1858-1927）在《大同书》⁴³中重新阐释了这一概念，这是一部令人意外但发人深省的著作。另外，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画像的左侧和右侧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这也再次体现了对普遍性的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不应与帝国主义学说相混淆，后者的目的是将自身强加于人，拒绝孤立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是对各种共同价值进行调和，我们可以称之为友好的多极化，在霸权统一和文明冲突之间开辟出一条中间道路。

转变范式以驾驭复杂性：“失败国家”和“失败世界”之间的互动

⁴² 高大伟，从中华复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复兴管窥》，第9页（见参考书目）。

⁴³ 《大同书》英文版，谭维理译，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1958年。英文版于互联网档案馆可读，中文版于中华典藏可读。在这部作品中，康有为写道：“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康有为对“大同”概念的这种重新解读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的源头吗？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新现象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这个世界相互依存关系前所未有的复杂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转变范式。如果“失败国家”的问题仍然存在，那么“失败世界”的问题，即一个无法自我更新治理机制的国际社会，很可能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风险。让我们借用一个建筑学的比喻。要保持稳定和持久，任何一座伟大的建筑都需要支柱来支撑，但赋予它凝聚力和平衡性的却是那块拱顶石。

我们从一个缺乏良好治理体系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发展到国际联盟，再发展到联合国，这个进程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法律建设来应对复杂的挑战，法律建设也构成了进步道路上的许多里程碑。在 21 世纪，政府间机制的完善只能通过文明之间的耐心对话来实现，本项研究希望能够为鼓励这种对话作出微薄贡献。

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版的由玛丽亚·兰根·里科夫负责的《2040 年全球趋势》报告⁴⁴，“悲剧和动员”是未来 20 年中可能出现的五种情景之一。根据这一设想，未来在一场巨大的悲剧发生之后，中国和欧盟将发起一场全球性的大动员，以重振多边机构，应对共同的挑战。

愿我们有足够的理智避免悲剧发生，我们知道今天的合作可以阻止悲剧的发生！现在，中国、欧盟和美国必须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起来，拯救人类免受不必要的苦难，并引领人类共同取得更大的进步。

⁴⁴ 《2040 年全球趋势》，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21 年 3 月。

David Gosset, sinologist, is the founder of China-Europe-America Global Initiative (2021)⁴⁵.

高大伟，汉学家、中欧美全球倡议（2021）45 发起人

⁴⁵ <http://www.ourglobalinitiative.com/en>

参考文献：

高大伟，《中华复兴管窥》（2018），上海译文出版社。本书阐述了中华文明复兴的要素及其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高大伟，《中国与世界》，意大利博洛尼亚 Il Mulino 出版社，第一、二卷先后于 2020 年和 2021 年出版，第三卷将于 2022 年 9 月出版。三卷本分别聚焦国际关系、经济与商业、文化三个方面。

附录：

2021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主席先生：

2021年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将隆重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将继续积极推动中国同联合国合作迈向新台阶，为联合国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主席先生！

一年前，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峰会，发表了政治宣言，承诺合作抗击疫情，携手应对挑战，坚持多边主义，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后世后代的共同未来。

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更加殷切，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每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必须以信心、勇气、担当，回答时代课题，作出历史抉择。

第一，我们必须战胜疫情，赢得这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人类总是在不断战

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我们终将战而胜之。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呵护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尊严。要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国际联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跨境传播风险。

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利器。我多次强调，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 1 亿美元基础上，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 1 亿剂疫苗。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

第二，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我们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在此，我愿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坚持发展优先。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多边发展合作进程协同增效，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和促进人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增强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通过缓债、发展援助等方式支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困难特别大的脆弱国家，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坚持创新驱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打造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挖掘疫后经济增长新动能，携手实现跨越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完善全球环境治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绿色复苏发展。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但我们会全力以赴。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坚持行动导向。加大发展资源投入，重点推进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国已宣布未来 3 年内再提供 30 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团结，践行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理念。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国与国难免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对话合作。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

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不会称王称霸。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将继续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第四，我们必须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

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联合国应该高举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成为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核心平台。要致力于稳定国际秩序，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走在前列。要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工作，制定共同议程，聚焦突出问题，重在采取行动，把各方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落到实处。

主席先生！

世界又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我坚信，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坚定信心，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